

大儒丘濬：清梦时时到海南

■ 吴辰



丘濬塑像。



海口丘濬故居。



《大学衍义补》。

丘濬、丘浚还是邱濬？

在海南，丘濬的名字代表着学养。自北宋苏东坡临琼以来，海南人才辈出，但是能被皇帝御赐“理学名臣”却仅有丘濬一人；而丘濬的影响力并非仅在其生活的年代，后世史家称其为“有明一代文臣之宗”，这更是无上的荣誉了。更神奇的是，丘濬一生研读涉猎极广，在饱读诗书之外，还精通经世致用的学问，他提出的很多政治见解甚至在数百年之后才能够听到回响。

在丘濬的故乡海口，这位明代大儒的名字更是深入人们的生活，许多街名、风物都和丘濬有着很深的渊源，例如文庄路、丘海大道、龙塘镇的蛇桥、施茶村的凉亭等等，仿佛丘濬仍然和我们一起生活在这个城市。但这样一位琼崖先贤，在民间，人们提起他的时候，却有些陌生，的确，丘濬不像他的同乡海瑞有着那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但他却默默影响着海南数百年文脉的发展。

大音希声的鸿儒

与其他历史人物相比，丘濬的一生似乎不够传奇。与他同村的海瑞这辈子轰轰烈烈，活出了一部《海公大红袍全传》，名列中国十大古典公案侠义小说，但丘濬一生的主要功业却全在著书立说上，一部《大学衍义补》虽为儒家经典，在民间却少人知晓，多少有点大音希声的意思。

丘濬的父亲早逝，其兄长丘源由祖父养大，祖父曾经叮嘱两人，称丘源可以守家业，以医术行世，为家乡造福；而丘濬则要走出去，将家业发扬光大，有朝一日甚至可以做

喜，恐怕丘濬如果知道人们常把自己的名字写作“丘浚”，也会闷闷不乐的。更何况丘濬在世时所留下的档案文献也都将其名字写作“丘濬”，其墓志铭上分明写着“公讳深，字仲深”更是告诉人们“濬”不能写作“浚”。

至于“丘”和“邱”孰是孰非，则牵涉到雍正三年的一则公案。清朝雍正皇帝尊孔，甫一即位就封孔子先世五代为王，到了第三年，更是诏令全国要避讳孔子姓名，将除了四书五经所载之外所有的“丘”字都加上了耳刀旁，于是，“丘濬”就变成了“邱濬”。同样命运的还有写《左传》的左丘明，硬生生被

改成了“左邱明”。而《明史》将其姓名写作“邱濬”则是因为这部史书虽然题为“明史”，却是清人所修；虽然动议于顺治年间，成书却在乾隆四年，雍正改“丘”为“邱”正在此时段内，自然要谨遵圣旨写作“邱濬”了。

当然，在丘家人后人里还流传着一个故事，称“邱”姓本为御赐，丘濬在朝期间学问、官品都堪称一代垂范，而最终又卒于任上，皇帝为了表彰这位老臣，特意在“丘”的右边加上一个耳刀旁，代表官帽之意。故事自然只是故事，但是其中蕴含后世对这位先贤的敬仰之情，溢于言表。

的并不是如何达到自身境界的完善，而是具体地为国家提出了一套治理天下的方法，从“正朝廷”“正百官”“固邦本”到“备制规”“慎刑宪”“严武备”林林总总，涵盖了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

在《大学衍义补》中，丘濬还提出很多经济之方，例如“谷，所以资民食；货，所以资民用”“君为民而立”“配丁限田法”等。所谓“经济”者，非当今所言资金，乃是经世济用之学，丘濬所提出的这些方案，虽然很多在现在看起来只是一个美好的设想，但是那种装天下在胸怀的担当确实令人敬佩。一代鸿儒正是如此，虽不见得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但一部《大学衍义补》已足以成就其万世不朽。

一生为天下苍生谋福祉

人们一提起丘濬，总会想起他那首作于少年时期的《五指参天》诗，诗云“五峰如指翠相连，撑起炎荒半壁天。夜盥银河摘星斗，朝探碧落弄云烟。雨余玉笋空中现，月出明珠掌上悬。岂是巨灵伸一臂，遥从海外数中原。”却很少会有人记得老年丘濬所作的《岁暮偶作》：“屈指明年六十三，人情世态饱经谙。同多黑发不曾白，无数青衿自出蓝。大半交游登鬼录，一生功业付空谈。不堪老去思归切，清梦时时到海南。”实际上，丘濬贵为群臣之首，运筹帷幄、指点江山自有一番气魄，但命运似乎总在与他作对。

丘濬曾经参加科举考试不中，回家备考期间妻子病故；事业刚见起色，母亲又病逝，需要回籍守孝三年；及垂暮之年又丧爱子；集一生所思写成的《大学衍义补》皇帝虽然赞赏有加，却未见按照自己的建议治国。于是，丘濬屡次萌生退意，怎料想丘濬越是思归，皇帝越不给丘濬回家的机会，于是，丘濬从正二品辞成了从一品，更跻身内阁之列，还顺便开了有明一代以尚书身份进入内阁的先河。既然辞无可辞，那就索性干下去吧，纵使眼睛已经几近失明，丘濬还是为皇帝呈上了《论厘革时政奏》等长篇奏折，动辄数千字。而皇帝也似乎离不开丘濬，宁可免了他早朝的任务，也要将他留在京师。终于，这位自天涯海角来的理学名臣没能离开碧瓦红墙的京师朝

阁，他倒在了自己的任上。也许，丘濬在去世前一年所作的诗颇能代表其心意：“王殿东头第一班，朝朝屏息奉龙颜。百年已自七旬过，一日都无数刻闲。恋土每怀生处乐，乞身当愿死前还。文渊阁下归来处，愁看残阳薄暮山。”其实，真正促使丘濬留下的并不是什么皇帝，而是天下苍生的福祉。

丘濬虽然已经是史书中的人物了，但是他为国、为民、为苍生的情怀却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琼崖子弟，至今，当人们途经金花村丘濬的故居、走过水头村丘濬的陵墓时，仍然会驻足敬仰，所谓大儒，也许正像这般，其情怀似水，润物无声。

雕塑《思想者》

《思想者》是法国雕塑家奥古斯特·罗丹创作的雕塑作品。该模型在罗丹的指导下有多个雕塑，最主要的雕像为青铜，底座为大理石材料，现藏于巴黎博物馆。1880年制作的石膏模型，现藏于巴黎罗丹美术馆。

《思想者》塑造了一个强有力的劳动男子。这个巨人弯着腰，屈着膝，右手托着下颌。他那深沉的目光以及嘴唇咬着拳头姿态，表现出一种极度痛苦的心情。他渴望沉入“绝对”的冥想，努力把那强壮的身体抽缩、弯曲成一团。他的肌肉非常紧

张，不但在全神贯注地思考，而且沉浸在苦恼之中。这件作品将深刻的精神内涵与完整的人物塑造融为一体，体现了罗丹雕塑艺术的基本特征。

1880年，法国装饰艺术博物馆即将动工，法国政府委托罗丹为它的青铜大门做装饰性的雕刻。这时，罗丹想到了雕塑家吉贝尔蒂于意大利佛罗伦萨洗礼堂北门创作的青铜浮雕“天国之门”。受此启发，罗丹决定以但丁的《神曲·地狱篇》为主题，创作一件表现人间地狱的雕塑。这就是后来的《地狱之门》。

20世纪初，人们把《思想者》视为一种改造世界力量的象征。
（杨道 编）



魏晋“嬉皮士”谢尚

■ 陈甲取

不得了，简直就是颜回再世啊！”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小谢尚自觉当不起这夸赞，他也没含着谦虚否认，而是站起来犀利地回说：“我就奇了怪了，在座的诸位中间没有孔夫子，又从哪里来的颜回呢？”一句话把客人噎得够呛。一众宾客都很惊叹于谢尚的早熟与聪慧。

谢尚擅长跳鸽舞（八哥）舞，堪称东晋舞王。一次宴会上，名士云集，宰相王导对谢尚说：“小谢啊，听说你很会跳鸽舞，在座的各位都想见识一下，要不你给露一小手，让大伙开开眼？”谢尚也不扭捏，爽快应道：“好呀，那就献丑了！”当即起身离席，拉开架势，像一只大鸟般旁若无人地翩翩起舞。

那优美的舞姿与欢快的节奏感染力十足，彻底调动了客人们的兴致，王导带着众人给他鼓掌打拍子，举座狂呼乱叫，嗨成一团。等谢尚一曲跳完，王导还意犹未尽地对客人

说：“谢尚跳街舞的姿态，让我想起了当年的竹林名士王戎。”当然，谢尚的舞技还是蛮能拿得出手的，就连大诗人李白都夸他说：“谢尚自能鸽舞，相如免脱鹔鹴裘。”

除了舞蹈，谢尚还擅长弹琵琶，这一点甚至得到了枭雄桓温的认可。有一次，有人谈起谢尚时，口气不是特别尊重。桓温就为他打抱不平，称谢尚在北窗下弹琵琶，那风采那模样，天上的神仙也不过如此。

尽管爱跳舞爱弹琵琶爱穿花裤子，但谢尚绝不是只知道追求时尚的纨绔子弟。史料有载，西晋末年，自秦始皇手下传下来的传国玉玺丢失。晋元帝司马睿渡江后，建立东晋王朝，几十年来，因为没有象征皇权的玉玺，接连几代皇帝都被笑话为“白板天子”，这皇帝当得就相当于赝品、冒牌货了。谢尚北伐时，将玉玺找回送给朝廷，为东晋皇帝的正名立下汗马功劳。陈郡谢家并非曹魏旧臣望

族，可以说，正是从谢尚这颗政治明星开始，经过谢安、谢玄等一系列后起之秀的共同努力，才一举奠定了陈郡谢家与琅琊王家并列为从东晋到南朝二百多年中最高门户的基础，说谢尚是陈郡谢氏百年辉煌的奠基人一点不为过。



国画中的谢尚(中)。 资料图

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究竟何意

■ 黄乔生

学校徽
鲁迅设计的北京大
资料图

诗无达诂，象有多义。

文学家鲁迅在平面设计方面颇有建树，如国徽、校徽、书刊封面和房屋改造图等。最近一个时期，鲁迅设计北大校徽引发了学界和大众的关注，成为热点话题。

我们正在编辑《鲁迅手稿全集》，收录现存所有鲁迅手稿、手迹，其中有一部分是鲁迅手绘图案，有猫头鹰、蜜蜂、国徽等，北大校徽图案自然也在收录之列。但鲁迅的设计草图已不存世，所以全集只能收入黑白复印件。其间，有专家提出见过最早的白底蓝字的北大校徽，曾在鲁迅博物馆展出，可对实物照相或扫描制版。可惜的是，鲁迅博物馆的这枚北大校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丢失，所以一时竟无法从对证。不过，这种鲁迅设计原图与现在面貌的差异也正说明：在北大一百多年的历史上，校徽的图案和颜色发生过变化，如增加英文校名，文字颜色由黑变红等。但鲁迅设计的篆书“北大”二字图案始终未变，而且总是处于徽章的核心位置。

因鲁迅博物馆所藏北大校徽丢失的话题引起一定反响，博物馆一位退休职工、也是《鲁迅手稿全集》编委会专家之一叶淑穗同志在2021年5月18日的《北京晚报》上发表了《寻“徽”》三十多载：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原件丢失始末》一文，回忆了遗失细节。那是1985年4月18日，鲁迅博物馆在接待外宾讲解时，发现展厅陈列柜中的校徽丢失。文章发表后，北京师范大学一位教授家属致电《北京晚报》编辑部，告知其家中有一枚这样的校徽。在北京晚报编辑陪同下，校徽持有者高继辉先生来到鲁迅博物馆，出示校徽请专家鉴定。这枚校徽白底黑字，背面印有编号744，系持有者的岳父屈震寰所有。屈震寰是河北定县人，1906年生，1925年入北大预科，1926—1928年离校参加北伐和南昌起义，1929—1932年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政治系学习并毕业。鉴定完成后，家属决定将其捐赠给鲁迅博物馆。这里可以提前做一个预告，观众在今年下半年改造完成的鲁迅博物馆鲁迅生平陈列中，将看到这枚校徽——尽管这并不是鲁迅设计后的第一批制品。鲁迅设计校徽时期的北京大学，每年招收学生很少，因此，第一批校徽恐怕已不存世了。

此外，还有一个契机。今年热播的电视剧《觉醒年代》在演绎新文化运动诸先贤故事时，设计了一个吸引人的情节，就是鲁迅设计北大校徽。

京师大学堂创立于1898年，1912年5月更名为“国立北京大学”。蔡元培1916年12月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学校还没有校徽和旌旗。蔡元培正是在考虑设计制作校徽时，想起鲁迅，遂写信委托此事。大力倡导美育理念的是蔡元培，鲁迅是拥护者和实践者，曾被蔡元培安排在教育部主办的夏期美术讲习班上讲授《美术概论》。在日常交往中，蔡元培得知鲁迅收藏古代艺术品，曾经写信给鲁迅交流心得，还向鲁迅借阅过拓片。所以从两人实际往来来看，蔡元培看重的是鲁迅的艺术鉴赏力和对中国古代美术的研究成绩。

鲁迅接受蔡元培的委托并完成任务。他在1917年8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寄蔡先生信并拟大学徽章。”信中可能向蔡元培说明了自己的设计思路，可惜该信不存。

《觉醒年代》播出后，观众争论的焦点是如何理解鲁迅设计图案的象征意义，图案设计妙在何处。综合过去人们对校徽意义的解释，大概有三说：一是“三人成众”，二是“民族脊梁”，三是“师生关系”。

“三人成众”说，指的是校徽上“北大”二字，上下排列，上部的“北”字是背对背侧立的两个人形，下部的“大”字是一个正面站立的人形，有如一个人背负二人，构成了“三人成众”意象。

“民族脊梁”说，认为鲁迅用“北大”两字做成了具形象的脊梁骨，希望北大生成为国家民族复兴的脊梁。电视剧《觉醒年代》中，北大同仁拿到鲁迅的设计图案，激动不已，交口称赞，即持此说。

我本人倾向第三种解释：“师生关系”说。

大学应以教师为主体，教师决定学校的水平和发展方向。1917年蔡元培上任北京大学校长后，着力于改造学校的风气，施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组建高水平的教师队伍。鲁迅是教育部官员，当然了解学校的运行模式；他还担任过中学的教务长和校长，深知管理学校和教书育人的辛苦，因此将老师放在画面的中心位置。

至于校徽的艺术来源，一般解释说：篆书“北大”二字由三个人字图形组成，徽章形似瓦当，具有鲜明的中华传统文化特色。我同意这种释义。

总之，校徽的象征意义是多方面的，以上几种解说都有道理，都有参考价值。但当拍摄电视剧或创作其他文艺作品时，势必要在这些意义中进行选择。



投稿邮箱 hnrbyfb@sina.com